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安岗新闻论集

陈崇山 陈日浓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安岗新闻论集

陈崇山 陈日浓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岗新闻论集 / 陈崇山、陈日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703 - 9

I. ①安… II. ①陈…②陈… III. ①新闻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1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85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冯春风
责任编辑 李尔柔等
责任校对 宗 合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3.25
插 页 6
字 数 492 千字
定 价 10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48 年,在太行地区工作期间,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拍摄 30 岁的安岗。



1948 年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负责合影。自左至右：
前：张盘石、安岗，后：袁勃、李庄。



1950 年代的安岗。



1950 年,周扬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苏。安岗任新闻组长。访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时合影。前右二为安岗,左二为翻译独伊(瞿秋白的女儿)。后排右一胡绩伟,右三朱穆之,右六王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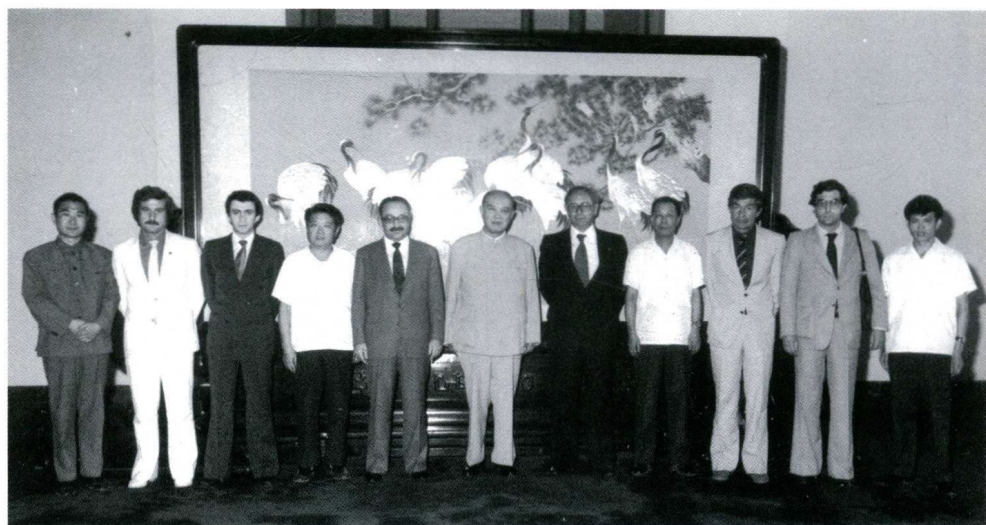
1956 年,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部分同学(56 级八班)合影,站立者左第三人为安岗。



上世纪 80 年代,在经济日报工作期间,与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交谈。左三为荣毅仁,左六为经济学家经叔平,左二为安岗。



1980 年,王震副总理接见美籍华人,原中央日报记者赵浩生及夫人,安岗陪同接见。
左五王震,左四赵浩生,左三安岗,左六赵浩生夫人。



1981 年,姚依林副总理(左六)会见外国记者代表团。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安岗(左四)和秘书长郭渭(左八)陪同接见。



1985 年,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访问苏联。左三安岗,左五戴伦彰,左一为翻译。后三位为苏联报纸负责人。



1981年12月7日至12日全国第一次新闻研究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前排左起第四人是新闻所副所长戴邦、第五人是首任所长安岗，右起第二人是副所长钱辛波。（陈崇山提供）



1988年，安岗新闻工作五十年座谈会。安岗同参会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师生合影留念前排居中是安岗同志。（蒋曙晨提供）



20 世纪末,抗战时期的老太行山新闻工作者聚会。前排:自左至右,左 1 为刘火,左 2 为刘江,左 3 为刘祖春,左 4 蒋牧岳,左 5 程宏毅,左 6 高戈,左 7 安岗。后排:自左至右:左 8 吴象,左 9 李庄,左 10 赵棣生,左 11 王友唐,左 12 张连德,左 13 杜波。(本书照片由安岗家人提供)

编者说明

安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毕生致力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他既有扎实的新闻实践经验，又有丰富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经历，新闻作品和新闻学著述颇丰，尤以写评论和夹叙夹议的政论性通讯见长。他的新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从民族民主战争到革命根据地建设，从迎接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前沿，他都留有名篇佳作，具有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献价值，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是安岗老师的学生，20 世纪 50 年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13 年 9 月，安岗夫人樊亢同志嘱托我们编辑安岗新闻著作选集。我们感到此一重任是对我们的信任，欣然从命。

尽我们之所能，现在编选工作已完成，全书多达近百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分编成上下两册。上册《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收入安岗一生从事办报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他在不同年代采写的新闻作品。为使读者对安岗有深切的了解，本书精选了新闻界部分同仁对安岗的记忆评述。安岗写下的新闻佳作名篇及精心策划的重要报道，都真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安岗为新闻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党党报艰难发展的风雨历程。下册《安岗新闻论集》，收入安岗对新闻学理论探讨、新闻业务研究、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理念、新闻与公共关系等多方面的理论文章，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安岗的新闻思想和改革主张。两册均选配有关于安岗新闻活动和生活的历史照片。

2 编者说明

鉴于安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称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所长，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创办人，《安岗新闻论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出版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们认为，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中国新闻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中国新闻史研究增添了“核心骨干”人物个案研究的活性元素，也为后人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新闻理论、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独特而生动的史料支撑和文献积累。在信息新技术的浪潮激活新媒体、多媒体竞发的今天，新闻事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新闻前辈的勤奋敬业和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践，依然值得后辈学习和传承。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出面为《安岗新闻论集》申报了社科院老年学者科研成果出版基金，得到院老干部局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社钱江同志提供了安岗同志的历史照片，经济日报社离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也派专人拍摄了安岗的相关图片资料；95岁高龄的新闻老战士鲁兮撰写长文，回忆安岗在《胜利报》时期的战斗岁月。有50余位同仁写有记述安岗的文章，因篇幅有限，只选辑了一部分，甚歉。对于在工作上给予安岗以关怀的朋友们、同事们（包括所有著文及没著文的），樊亢同志特嘱乘出书之机，深表感激。特别要感谢当年太行山的“小鬼”孟祥祯同志，为安岗晚年整理文稿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编务工作，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本书疏漏差错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陈崇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陈日浓（原《今日中国》副总编辑）

2014年7月1日

在新闻传播领域跋涉一生(代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学生)、新闻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为我从事新闻工作50年开纪念会。同志们说了发自内心的话。我感谢同志们给一个新闻老兵的深情厚谊;同时,也感到惭愧。我的惭愧不是开纪念会才有的,而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那时候,我去采访起义的高树勋将军,采访被俘的马法五将军,采访同国民党展开争夺战的战友们。我工作之余颇有一点刺痛,就是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我念书太少,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少。到了解放战争和以后的全国解放,担负中央级报纸的报道责任时,感到了自己后劲不足,才疏学浅,常常悔恨未能充分利用太行山八年抗战时间,把自己的脑袋多充实一点儿。吃后悔药是没有用的。自己多少还有点不甘落后的劲儿,在实践中尽最大努力去掌握形势,体会政策,尽可能多地发挥作用。记得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后跟党中央商量,要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陈述他对时局的看法。组织上让我起草这份电报,字数为2500字,要用高树勋的语言,有点官腔官调,也要用一些古文。给我三天时间。我不知深浅,头一天在古文上咬文嚼字。我虽然念过两年古文,到现在只记得一些孔孟的“语录”,但一参加革命把古文给打倒了,现在要学古、用古,就是“古”不上来。当时,朱穆之、陈希玉和我住一间屋子,我同他们商量,到底该怎么写?他们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是装腔拿调就是了。这时我想,如果我小的时候用点功,肚子里头要有100篇古文,现在就不会太吃力了。但毕竟还是有一点古文底子,就使劲往里面抠。最后,通电写成了,延安新华社一字不改发出来了,还登在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重要位置上。高将军见我说，你给我代写的通电，够味，我很满意。听了这话，我心里并不是味儿。这时我认识到，一个不会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至少会遇到许多的烦恼。

我50年没离开新闻事业，没离开写东西。虽然主要的时间是做的领导工作，做夜班工作，做编报工作，写的大多是社论、评论，但也常常忙里偷闲，下去跑一些地方，匆匆写点东西。1980年代过去了几年，出了5本书，太可怜了。应该不是5本，而是10本、20本。这不是作为一个新闻老兵的忏悔，而是向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中年的同志们提出的一点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一点外交辞令的忠告。

我是相信人的能力需自觉开发的。一个人，一生应该是灿烂的一生。生命是要人自觉去开发的。灿烂的一生需要非常雄厚的基础，基础是在尽可能不浪费时间的情況下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打得越牢，自己就越能够掌握主动，就能够在形势变化的瞬间起飞，说不定能够成为像范长江那样名扬四海的名记者。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把自己开发出来，是个平庸之辈。希望大家以我为鉴得到一点启发。我的结论是一个人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掌握一点安排自己命运的自主权。要探索开发自己的能量（包括潜能）的各种方案。逆境、困难、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循苟安，无所作为，不求上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阶梯，突破一道又一道的人生难关。

在我50年的工作中，有深深感触的还有以下几点：

我能够50年坚持从新闻岗位上走过来，应该感谢最初领我走上新闻岗位的前辈们，包括党组织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老前辈。从党组织来说，1935年我在天津汇文中学上高中时候，就与党组织有了联系，我能够有面向社会、研究社会、探索社会问题这点勇气、这点思想，是跟党的启示分不开的。我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活动，参加了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种学生运动。天津的“一二·九”运动我也参加了。我对于红军，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朱德，对于真理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有了认识。一个人的一生的贡献，就是要为人类做出自己的牺牲。这一思想，使我在一生中受用不尽。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我成为天津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从此

奠定了我50年工作的基础。这些同志有的还健在,如程宏毅同志、姚大衡同志、王健同志、纪波同志等,人数不多,但当时我们在天津是一个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集体。天津党组织的教育,同学的互相帮助,使我在1936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道路的目标,并一生为之奋斗。

我要记住两个人,是他们把我领进新闻界的。一个是罗隆基先生,当时他在天津主持笔政,每天为《益世报》写社论。他的社论有抗日的激情,有反抗敌人的呼号。1936年敌人曾放出风来说,如果他每个星期仍然去天津的青年会演讲,就要暗杀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青年会,看罗先生是不是还去演讲,看敌人是不是要暗杀他,看暗杀他时我能不能助罗先生一臂之力。他写的抗日的社论,宣传正义。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可以作为我的榜样的。另一位是《益世报》社会服务版的主编吴秋尘先生。我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要求是向他提出来的。接到我的信,他找我去。当时吴先生并不信任我,但还是接见了我,鼓励我试一试。我写好以后,发表第一篇通讯的时候,他加了编者按,肯定了我写的东西。吴先生是我最早的新闻老师。他曾带我去看了“粥厂”。去看时,我想,“慈善”家会给穷人喝粥,穷人可以苟延生命,总比倒毙街头好一些。但到里面一了解,发现那里面有很大的剥削:“慈善”家给粥里掺大量的水,还掺了沙子,使我看到了“慈善事业”里面也有一点伪善性。吴先生说:“你应该写一篇”。以后,吴先生经常鼓励我,要我多写文章。他说:“现在多写,是为了给将来写好打基础。你写的东西我很喜欢,因为没有旧记者的味道,笔调清新。”后来,日本人通缉我,党组织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走了,来不及同吴先生告别。前几年,我去天津,《天津日报》研究《益世报》报史的同志告诉我,因在日本占领时期《益世报》有些问题,跟吴秋尘有多大关系似乎也没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后来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东北劳动,死在东北。说明我50年新闻工作的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这两位先生,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不管怎样,我不能忘掉历史,忘掉影响自己成长的前辈。我永远怀着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

在我 50 年的新闻工作中，起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我在 1930 年代就认识了革命前辈薄一波同志。1936 年我到了太原，薄一波同志当时是党的负责人，他是代表党同阎锡山合作主持山西抗日运动的，也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老革命。他的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的领导艺术，我很敬佩。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办公室。我和我的战友纪雨秀同志一块去见他。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 CP（即共产党）还是 CY（共青团）？”我说：“我是相信真理愿意为真理奋斗的人。”听了我的回答，他笑了起来，然后他就谈到我的名字，说：你的名字“安”字是原来的，“钢”是后改的。我说：“是。”他问我原名叫什么，我说叫安正元。他说你的名字“钢”，对山西的上层人士有刺激作用。确实，我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以后，把“安正元”改成“安钢”的。一波同志说：这个“钢”俄语读音为“斯大林”。“斯大林”就是“钢”。有的人知道你的名字的背景，会引起人们对你的不必要的注意，这样不利。他就把“钢”字改成了“岗”。就是我现在的名字。

我曾问一波同志：“阎锡山能不能抗战到底？”他说：“听其言，观其行。从现在看，出于各种利害的考虑，他愿意抗日，我们跟他合作抗日。但不能保证他能和我们合作多久，时间是算不出来的。”纪雨秀同志问他：“抗战是持久战。大概能战到什么时候？”一波同志笑了笑，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能够算到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但不能算到什么时候战争能够结束。”

刚到太原，我是在“民众训练团”的一队（这个团共五个队）。一队都是平津来的大学生，分两部分人，“民先队”和进步青年，这是大多数。另一伙人是“蓝衣社”的。由于生活很苦，蓝衣社的大多是公子哥儿，坚持不住，大部分人很快就走了。这就形成了我们党的和民先队的优势。当年的老大哥、老战友有刘有光、王鹤峰、严佑民等同志，都是老革命。刘有光是一队的工作员，我们彼此关系很好，我当时也是民先队的负责人。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有人小声叫我，我起来一看是刘有光。他告诉我：宋哲元逮捕你的通缉令已到了太原。一波同志要我转告你，山西会保护你